



核心阅读

认清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整体面貌，需要考察其在冷战后的现实流变。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非但没有找到真正解决人道主义灾难之策，反而在其泛滥地留下了混乱和失序。

干涉贯之以人道主义的称谓，似乎就具有了某种正当性。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干涉别国事务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惯有手法。但即便是怀有善意的人道干涉，在实践中也鲜有长出善意的果实，人道主义干涉非但没有找到真正解决人道主义灾难之策，反而在当地留下了混乱和失序。认清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整体面貌，需要考察它在冷战后的现实流变。

新干涉主义：冷战后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新标签

整个冷战时期西方的人道主义干涉行为并不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权原则起到了重要作用，《联合国宪章》明确禁止干涉他国内政，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降低。另一个是两极格局的权力制衡。在两大集团的政治军事对抗中，维护自身安全、争取战略利益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优先考虑，任何一方的对外干涉行动都可能造成重大的国际后果，因而都对干涉

的实施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

冷战结束后，人权保护开始得到西方国家的明确支持和前所未有的重视，人权理念指引下的“新干涉主义”成为西方国家应对人权保护问题的主要举措。其原因有三：一是冷战结束打破了国际层面的权力平衡，西方的人道主义干涉行为不再受到权力结构的制约。二是苏联的解体，面对倏忽而至的胜利，西方国家希望找到不战而胜的秘诀。在这一过程中，尊重和保护“普世性”的人权价值观被西方认为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继续实施人权保护就成为彰显其价值观的必需。三是冷战结束初期的巨变，使国际社会在维持和平、保护平民、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等方面陷入某种僵局。1993年索马里维和失败、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1995年塞尔维亚斯雷布雷尼察惨案等事件，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对人类良知产生极大震撼，引起各界人士的深刻反思。这表明联合国相关行动的不确定性与不完善，无法充分实现预期目的。此后，采用军事手段及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其支持者甚至辩称，只要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武装干涉是一种“道德责任”，就是“正义战争”。

新干涉主义的起点在于“人权至上”和“人权高于主权”。在它的逻辑链条中，西方首先要突破的是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的约束，构建起一套自洽的话语体系，从而能更加顺利地推行其人道主义干涉行为。在这一套话语体系中，亟须明确的是，国家“干涉的权利”到底从何而来。1999年

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国际共同体主义”讲话中指出，全球化使得各国成为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国际国内事务已无法完全分离，一国内部若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国人民，其他国家和人民自然拥有“干涉的权利”。同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第54届联大发言为科索沃战争进行辩护：国家主权不能成为一些践踏人权的国家免受干涉的借口。至此，新干涉主义的核心理念和政策主张清晰起来，“干涉的权利”也因此成为西方国家从事人道主义干涉的主要借口。在这种理念下，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成为新干涉主义的尝试。

新干涉主义相比早期的人道主义干涉试图在三个方面作出修正：一是将自己的干涉行为赋予更多的道德色彩和伦理原则，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性；二是从“权利”的角度出发以规避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对干涉行为的约束，以此说明干涉行为的合法性；三是试图构建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规范，掌握国际干涉的话语权。基于此，它们将北约介入科索沃宣称为“价值之战”，把美国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称为用“法治”而非“权力政治”来建立世界新秩序，军事介入旨在保护个人的权利，而非解决国家的安全问题。尽管做出种种努力，但整个1990年代的国际实践表明，新干涉主义更多的时候成为西方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幌子，人道主义介入也偏离了“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等已经为联合国宪章所采纳的准则。当干涉站到主权的对立面时，失败也就可以预期了。这也成为“保护的责

任”在21世纪初粉墨登场的重要原因。

“保护的责任”：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新手段

“保护的责任”发展演变的基础是所谓的“主权的责任”。1995年，前苏丹外交官弗朗西斯·邓及其同僚罗伯特·科恩首先提出“作为责任的主权”的观点，随后在其主编的《作为责任的主权：非洲的冲突治理》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该思想。他们认为，一国在行使主权时，除了享有某些国际特权，还必须承担保护人民的长期义务；当一国不能履行这种责任，应该邀请和欢迎国际帮助来完成国家的努力。该理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质疑和担心，因为它超越主权是对领土和领土上的国民的控制的传统界定，背离了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1999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联合国首脑年会上发表题为《两种主权的概念》的演讲。他认为，绝对和排他性的主权时代已经过去，国家主权蕴涵着保护“个人主权”的责任，领导人的职责是在良好的内部治理与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之间找到平衡点。

邓和安南等人对国家主权的重新诠释，其实遵循了一种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国家主权除了对外功能还蕴含着对内功能，即，持久尊重并切实保障民众个人权利的实现，既是国家主权的权利，更是国家主权的责任。只有这两种功能都实现的时候，理想

中的国家主权才能成为现实。正是这种功能主义分析，为“保护的责任”出台指出一条可行路径。

2000年，安南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国际社会就人道主义干预达成共识。作为响应，加拿大政府提议成立“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作为解决相关问题的国际协调机构。2001年12月，该委员会向安南提交了一份题为《保护的责任》的报告，正式提出“保护的责任”的概念：主权国家有责任保护本国公民免遭可以避免的灾难——免遭大规模屠杀和强奸，免遭饥饿，当它们不愿意或者无力这样做的时候，必须由国际社会来承担这一责任。2005年3月21日，在第59届联大上安南首次正式将“保护的责任”的基本含义传达给各国，并提请各国予以考虑。2005年9月召开的世界首脑会议上，“保护的责任”被写进了150多个国家签署的《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2009年，第63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了讨论秘书长关于《履行保护的责任》报告的辩论会，2/3以上的联合国成员国代表对报告表示肯定。此次会议提出了实施“保护的责任”的三大支柱的建议：国家的保护责任（保护人民免于种族屠杀、战争罪、族裔清洗、反人类罪）、国际援助与能力建设、国际社会及时而果断的反应。这为“保护的责任”由概念走向实践提供一个可操作的路线图。

“保护的责任”之所以能够替代“干涉的权利”，一方面，在于它对主权和人权的边界从功能上加以区隔，使干涉不再那么激烈地站在主权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保护的责任”作出

前景黯淡的阿拉伯版北约

□ 郑东超

新年伊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中东。推销中东战略同盟，摸底潜在成员国考量，是此访重要内容。中东战略同盟是特朗普政府推动打造具有军事安全性质的多边同盟。它借鉴北约的组织 and 运行模式，又常被称为阿拉伯版北约，建成后主要成员包括海合会六国、埃及和约旦。该同盟目前处于规划阶段，尚未实践成型。美国推动组建阿拉伯版北约，意在重整中东盟国资源，为已减负，对伊朗和恐怖组织予以双遏制。但成员国间矛盾分歧较大，会将稀释多边同盟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中东战略同盟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5月特朗普访问沙特，出席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和美国峰会，会议通过《利雅得宣言》，其中提出组建中东战略同盟，总部拟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该同盟号称要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目前，同盟处于规划酝酿阶段，尚未实质运转。特朗普之所以另起炉灶，推动建立新多边同盟，是综合因素的结果。

减轻美国在中东地区维护安全的成本，推动盟国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在不重大投入的情况下，美国重整盟国资源，形成强劲合力，实现预期目标，以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提升中东国家遏制伊朗的力度和强度，在伊朗周边形成高压“气旋”。联合中东盟国围堵伊朗，是美国对付伊朗的重要手段。通过在伊朗周边形成高压态势，以压促变，有效抑制伊朗的地区行为，希望实现塑造一个亲美的伊朗。

通过打造多边同盟，向地区盟国彰显美国不会退出中东。面对美国战略收缩，中东盟国不可避免地内生焦虑不安情绪。

特别是2018年12月，特朗普宣布美军撤离叙利亚，中东盟国顿感失望震惊，再次引起美国是否靠得住的讨论。组建中东战略同盟也是向盟国表明，美国不会离开中东，是靠得住的。

向中东国家出售武器装备，获得更多经济利益。中东战略同盟具有军事安全性质，成员国为增强自身实力，势必会升级武器装备，美国可趁机兜售武器。通过出售武器，拉动美国就业，争取军火商对特朗普的支持。

中东战略同盟之所以又称阿拉伯版北约，是因为以北约为模板，参照北约组织模式运行。北约自1949年建立并持续至今，重要原因在于拥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安全威胁以及较强整体协调能力。正在筹建中的中东战略联盟成员国在价值观上有共同之处，但共同威胁不突出，相互协同力不足。筹建中的中东战略同盟是“6+2+1”结构，即海合会6个成员国、埃及和约旦、美国。美国居主导地位，海合会成员国是“骨架”。安全机制的形成要求高度的凝聚力。内部整合难度大、凝聚力不强一直是阿拉伯世界存在的问题。不少阿拉伯国家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缺乏信心，难以将本国安全置于多边安全组织中。

准成员国之间存在矛盾，难以真正形成合力，多边安全合作难以形成正面叠加效应。2017年6月，卡塔尔危机爆发，卡塔尔和沙特、阿联酋关系急转直下，海合会内部出现裂痕，至今尚未平复。在酝酿阶段，阿拉伯北约显露出举步维艰的疲态。

遏制伊朗是美国打造中东战略同盟的重要目标。中东战略同盟的准成员国对伊朗威胁认知有差异。以沙特、阿联酋代表，将伊朗视为最大安全威胁，遏制伊朗的态度非常坚决。卡塔尔、阿曼主张对伊

影响辐射到全社会，防控风险应当成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充分发挥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专业协会的作用，建立党政领导、专业协作、全社会参与的风险防控协同机制。分解风险防控的各种职能，使得咨询、指挥、协调、执行等部门和人员减少相互摩擦，能够保证在重大风险面前集中统一配合行动，防止社会资源的分散消解。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尽量调动运用好已有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各级各部门的相互协商通报，把各类风险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加强风险防控措施及时反馈优化和善后，不留死角，根除隐患，形成

朗采取温和态度。在卡塔尔危机中，伊朗站在了卡塔尔一边，这为伊朗和卡塔尔走近加分不少。阿曼在中东地区奉行中立外交政策，不愿与伊朗闹翻。由此看，中东战略联盟成立后各成员国在遏制伊朗上协调行动难度较大。

同盟组织是两个以上国家联合对抗另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具有强烈的对抗性、排外性、竞争性、封闭性、零和性特点，掺杂着浓烈的冷战思维。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末期，美国仍高举同盟旗帜，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必将对中东安全格局造成消极影响。

筹建中东战略同盟将会恶化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美国实际上是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要求地区国家选边站队，加重地区阵营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中东国家碎片化程度。

美国的地区同盟政策，是狭隘安全观在作祟，缺少大安全观。安全问题是联动问题、全局问题，以远近亲疏为原则，一边倒地以本国利益和亲己的国家利益为中心，忽视或淡化其他国家利益，不仅不会有效解决安全问题，还会恶化地区紧张趋势，地区竞争愈演愈烈，零和博弈越来越明显。

美国组建新同盟还会引发中东地区新一轮军备竞赛。中东战略同盟的筹建必将进一步恶化伊朗外部安全环境。在这种地区安全形势变动背景下，中东地区可能会迎来新一轮军备竞赛。



风险防控的整体良性效应。

健全完善风险防控责任机制。各级各部门都要积极对照排查风险，明确自身责任所在，明确履行各自责任的重点。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干部要负起主要责任，对风险的产生及后果有充分认识，及时到位部署推进重大风险防控工作，积极承担起防控重大风险的领导责任。对于关键岗位、关键人员，要明确责任、加强监督检查、强化激励约束，做到在风险面前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担责，在重大风险责任的自觉担当中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

（上接1版二条）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的活跃期，我国大踏步赶上了科技发展的新时代，信息、生命、制造、能源、空间、海洋，特别是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向经济和社会全领域渗透，技术催生的新经济形态正旺盛发展。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增加值均以两位数增长。随着新经济权重的持续上升，新经济必将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形态，我国经济将迈进新的良性发展的时代。

我国经济拥有不竭的发展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国改革开放总体上经历了先易后难、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分散后综合的过程，这就决定了越往深度推进，难度越大、挑战越大。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问题就是潜力，挑战就是机遇，改革开放的成效与战胜困难的难度往往成正比关系。

要素配置将更有效率。我国价格改革是从下游产品市场逐步向上游要素市场展开的，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要素配置效率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目前，土地市场“招拍挂”制度正在加快完善，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定价机制正在逐步健全，金融资本市场、技术专利市场改革正迈出重大步伐。要素市场的价格改革将持续释放发展动能。

市场主体将更具活力。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工商个体户等在内的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力之源。回顾改革开放进程，我们在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持续推进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的格局已经形成。但离打造更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目标还有明显差距，非公有制经济仍然面临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

象，国有企业改革任务还比较重，我国市场主体的内生创新动力还有待进一步释放。

政府作用将越来越好。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主线，政府能否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是市场化改革的前提和关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行政改革全面提速，尤其是“放管服”改革成效显著。但是，政府在行政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越位、错位和缺位等问题，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仍然任务艰巨，通过政府行政改革来释放市场活力、提高政府行政效能仍然有巨大的拓展空间。

开放空间将更加宽广。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开放，在全球市场环境中参与分工合作、强化比较优势、寻找自己发展方位，极大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面向未来，已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中华民族，有更强的自信汇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更主动的全面开放，将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更大的动能。

我国经济拥有不变的发展定力

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前景广阔是定力和大势。这种定力和大势，既是中国经济自身规律使然，也是国家和人民的坚定选择，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如磐石的意志。

定力源于挡不住的发展惯性。我国经济保持了40年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GDP净增6万亿元左右。这种长期的持续性的增长，犹如中国高铁，速度太快不行，但速度慢了也不行。我们提出保持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就意味着允许经济增速有一定的弹性浮动，但不能大起大落，更不能也不会“断崖式下跌”。

定力源于对美好生活的向

四个方面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合理性与合法性。一是强调弱者得到保护的权利和国家负有保护公民的责任，并把这界定为国家主权的责任。二是抛弃强国介入的权利，强调国际社会在国家未能履行其责任时具有保护受害者的道德义务。三是“保护的责任”承认主权国家在履行保护该国平民安全中的主体地位，国际社会只有在该国无法或不愿履行这一职责时才能介入。四是“保护的责任”在法理上加强了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权威性。这样一来，通过“保护的责任”，西方国家在逻辑上建构了保护的责任与国际介入的一致性，将情感视角转变为关注受害者，将辩论焦点引向需要获得帮助的弱者，将有争议的问题去政治化，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道德性。在此过程中，通过对国家主权与人权边界的重构和对联合国权威的再造，西方意在为干涉行为建构新的国际规范的意图也昭然若揭。

尽管用心良苦，但“保护的责任”不可能彻底解决人道主义灾难，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干涉无法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的机会，而这种机会的丧失恰恰是西方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秩序所导致。没有可持续的发展，干涉的人道主义色彩也将不复存在。事实上，2011年“保护的责任”在利比亚首次实践和2015年以来西方试图在叙利亚再次复制该行动的努力，留给当地的并不是人道主义灾难的解决，反而是更大的灾难——混乱和失序。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如此之大，让人错愕。世界需要的究竟是“保护的责任”还是“负责任的保护”，也就成为国际社会对西方人道主义干涉的新拷问。



住。中国人民从发展中获得了巨大实惠，不但解决了温饱，而且正向着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劳动才能创造幸福、发展才能拥有幸福，这已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信念，人民群众思定、盼富、谋发展。人心不可违，谋发展、稳发展是全体中国人的期盼，已经汇聚成了磅礴的发展力量。

定力源于复兴梦想的驱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经历了晚清时期的努力、辛亥革命的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梦想。但伟大梦想决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可以实现的。我们还是追梦人，还在追梦中，实现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是保持发展定力的巨大引擎。

定力源于党中央的坚定意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以坚如磐石的意志谋发展、促发展、引领发展，为保持发展定力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他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全面正确把握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取向，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我国经济一定能够行稳致远。

显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等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必然发生的发展中的问题，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只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全面正确把握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取向，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我国经济一定能够行稳致远。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总编辑〕